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
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
总编 李忠杰
副总编 周勇 李蓉 姚金果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 统一战线工作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
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编
主编 王福琨 邓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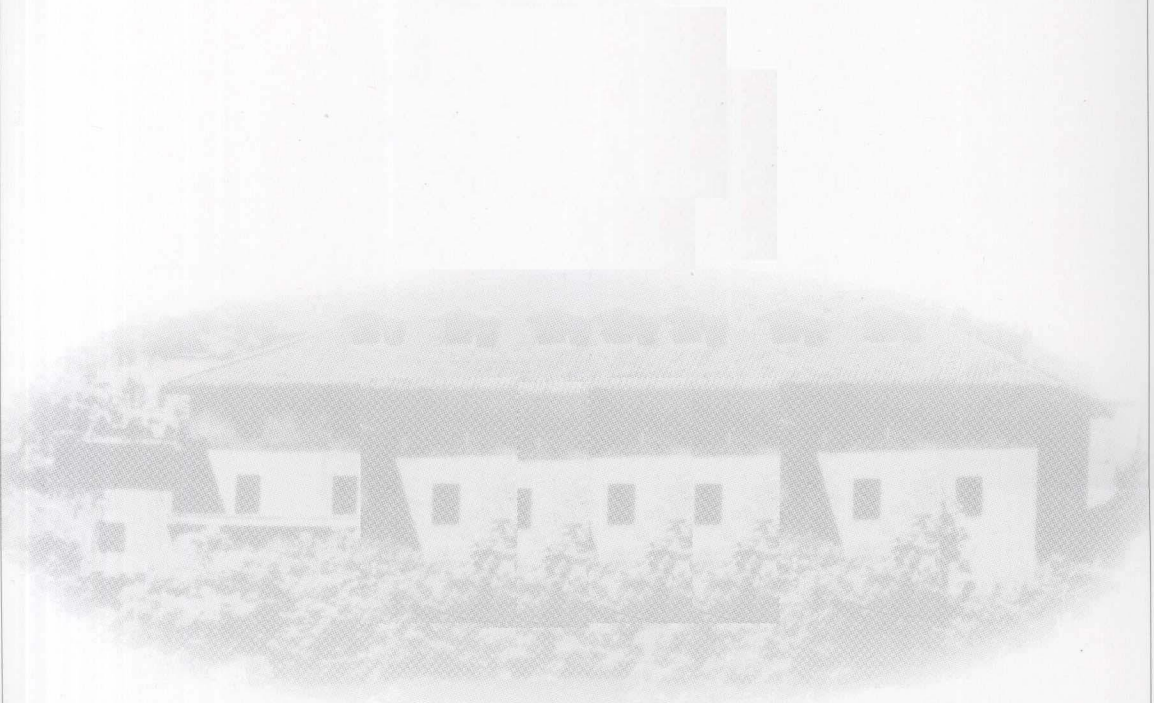


中共党史出版社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组织编写
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
总编 李忠杰
副总编 周勇 李蓉 姚金果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 统一战线工作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
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编
主编 王福琨 邓群



中共党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王福琨,邓群主编;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编. —北京:

中共党史出版社, 2009. 5

ISBN 978-7-5098-0264-9

I. 中… II. ①王… ②邓… ③中… III. 中国共产党—
地方组织—统一战线工作—史料—重庆市—1937—1945

IV. D61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59734 号

书 名: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

主 编: 王福琨 邓 群

编 者: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党史研究室

责任编辑: 潘 鹏

出版发行: 中共党史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南街6号院1号楼

邮 编: 100080

网 址: www.dsck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62mm×230mm 1/16

字 数: 420 千字

印 张: 27.5

版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98-0264-9

定 价: 53.00 元

此书如有印制质量问题,请与中共党史出版社发行部联系

电话: 82517249, 82517244

总序

《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编委会

中共中央南方局,是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中共中央派驻国民政府所在地重庆的秘密机关。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历史,见证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曲折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伟大历史的重要篇章。

抗日战争爆发不久,中共中央就决定建立中央工作机构,推动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对国民党统治中心区域党组织的工作。1937年12月,中共中央于前期筹建的“长江沿岸委员会”基础上,在武汉成立了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中共代表团,全面领导长江以南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中共党组织的工作。1938年底,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根据抗战相持阶段到来后的形势,决定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成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以下简称南方局)。

1939年1月,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至1946年5月,南方局东迁,改称中共中央南京局。其间,南方局实际存在大约八年之久,先后由周恩来、博古、董必武、王若飞等担任书记或代理书记。在这一时期内,南方局在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高举抗日民主两大旗帜,坚定贯彻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领导南方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包括云南、四川、贵州、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江苏、上海、江西、福建和港澳地区等)的中共党组织,以及在此范围内设立的八路军(新四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群众》周刊等公开机构,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下坚持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南方局的历史,与此前的中共中央长江局和之后的中共中央南京局,以及东迁后在重庆建立的四川省委,还有一个前后相继的历史关系。因此,南方局的活动,基本上

涵盖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整个历史过程,它的光辉历史和卓著功绩是中国共产党历史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南方局把维护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战争向前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坚定地贯彻中共中央“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与国民党进行艰难复杂的谈判和合作,与国民党内妥协、分裂、倒退的倾向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广泛争取国内外进步力量的同情和支持,配合抗战根据地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三次反共高潮,几度力挽濒临破裂的国共关系,维护国共合作和团结抗战局面直至抗战胜利;抗战胜利后,又配合毛泽东进行重庆谈判,参与政协会议和停战整军谈判,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建国的前景做出了不懈努力。

南方局创造性地贯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努力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主动与各中间党派广交朋友,与他们风雨同舟,促成了中国民主同盟、九三学社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等的建立;团结民族工商界投身抗战民主,支持他们反对官僚资本、争取自身权利的斗争;争取地方实力派,推动他们在坚持抗战争取民主中不断进步,逐步走向人民阵营;团结海外侨胞,争取他们对民族抗战事业的支援;抗战胜利后,发动和领导国民党统治区和平民主运动,适时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转化为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第二条战线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南方局充分利用公开文化机构,广泛团结进步文化人,以雾季戏剧演出冲破顽固派的文化封锁,掀起国统区进步文化运动高潮;关心保护爱国知识分子,组织被誉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的香港大营救;鼓励进步知识分子开展社会与自然科学研究,为新中国储备建设人才;领导《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坚持“抗战号角,人民喉舌”的宗旨,使之成为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进步文化的重要阵地。南方局的文化工作极大增强了爱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共产党的向心力,造就出一支为民族解放呐喊战斗的文化大军。

南方局配合中共中央领导新四军和华南敌后游击斗争,指导建立和发展广东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以及南路人民游击队等人民武装,开辟了敌后根据地;领导粤、滇、黔边、粤桂边、闽粤赣边等地武装斗争,使之不断发

展,壮大为成建制的正规部队,在解放战争中建立功勋;领导地方党组织深入农村开辟工作,掌握部分武装,以应对日军入侵和积蓄革命力量;积极开展军事统战,推动国民党爱国将领参与抗战和支持民主,进而在解放战争中率部起义,加入人民军队行列。

南方局把以工、农、青、妇为主要对象的群众工作,作为加强党的建设、发展统一战线、开展武装斗争的基础,通过抗日宣传、募捐献金、战地服务,掀起抗日救亡高潮;在“反汪”运动、宪政运动中动员群众;按照“三勤、三化”要求,深入群众,建立据点,积蓄力量;动员群众参与反对“一党国大”的斗争,在领导胡世合运动中迎来抗战胜利;领导一二一运动,促进政协成功,在和平民主运动高潮中推动进步群众组织的建立;在领导群众求生存、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中推动第二条战线的形成。

南方局把开展国际交往,扩大国际统一战线作为外事工作的特殊使命,以“宣传出去,争取过来”的外事工作方针为指导,充分利用公开合法的各种渠道,与各国外交使团和国际友人广泛接触,宣传中共的抗战主张和抗日根据地的实绩,揭露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真相,从而赢得国际社会和国际舆论的广泛同情与支持,打破了国民党的外交垄断。特别是1945年董必武出席联合国会议,成为我党独立外交的重要开端。南方局的外事工作作为中国共产党拓展了在国际政治舞台的活动空间,为新中国外交事业奠定了重要基础。

南方局高度重视党的建设,把“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始终作为“极端严重的任务”和“完成党的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在恶劣艰险的政治环境中,创造性贯彻中共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十六字方针,思想上重视党员理想、信念和气节教育;组织上坚持“质重于量,巩固重于发展”原则;工作上执行“三勤”(勤学、勤业、勤交友)、“三化”(职业化、社会化、合法化),党的组织始终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在群众中扎下了根,稳住了脚,使国民党统治区各级党组织不断巩固发展,经受住了各种考验,成为摧不垮的战斗堡垒,带领人民坚持抗战和争取和平民主的中坚力量。

历史充分证明,南方局领导下的国民党统治区和部分沦陷区的革命斗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方面。它的历史功绩,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胡乔木同志曾经

指出：“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抗日战争时期那么一种局面，团结了大后方那么多的人，把抗战坚持了下去，还保存了我们党的一大批精干力量；没有南方局的大量工作，就没有后来解放战争时期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形成那样强大的第二条战线。”“没有南方局在大后方进行的广泛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很难把当时在国民党区域的各民主党派和各方面人士团结在我们共产党的周围，后来我们建立新中国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就没有今天这样的局面。”“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从一个方面的意义上讲，为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宋平同志也曾经总结道：“南方局在党中央的领导和周恩来同志的亲自主持下，做了非常有成就、非常出色的工作，经验是非常丰富的。不论是党的建设，从秘密工作到公开工作；统一战线，从基层到上层；文化战线工作，都做了很多工作。这些经验，在党的历史上确实非常宝贵。把这些经验按照历史本来面目加以整理，加以提炼，就会丰富我们党的历史宝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恩来等南方局领导人在领导国民党统治区中共党组织进行革命斗争过程中，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所建立的光辉业绩、积累的丰富经验、培育的红岩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

改革开放之前，由于受“左”倾错误的严重干扰，南方局历史资料的征集和研究工作基本处于停滞状态，南方局的历史功绩和丰富经验更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和总结。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中国共产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恢复，中共党史研究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上世纪80年代初，在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领导和原南方局所辖省区（市）党委支持下，成立了以宋平、孔原、童小鹏、荣高棠等部分南方局老同志为核心，有关地区党史部门业务人员为骨干的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开始进行南方局党史资料的征集与编研工作，并很快在史料征集方面取得成效。1985年，经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同意，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与有关地区党史部门共同确定，合作编纂六卷本的《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并纳入中共党史资料丛书系列，由此正式拉开南方局党史资料编研工作的帷幕。1990年6月，在中央及相关省区（市）党委的支持下，经过南方局老同志与各省区党史部门四年有余的努力，由胡耀邦同志题写书名的六卷本《南方局党史资料丛书》正式出版，并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隆重的首发座谈会。此套资料丛书的出版，为南方局历史研究宣传奠

定了良好的基础。1990年初,完成使命的南方局党史资料征集小组宣布撤销。

2002年5月和10月,江泽民同志、胡锦涛同志先后到重庆视察并发表重要讲话,高度评价南方局历史功绩,深刻阐述红岩精神,要求认真总结南方局的历史经验,大力弘扬红岩精神。同年10月,中央办公厅秘书局遵照中央领导指示,提出《关于加强中共南方局历史研究问题的意见》(中秘局[2002]97号),批复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以及重庆市委等有关省区(市)党委,部署开展新一轮南方局历史资料的征编和研究工作,得到了各有关部门和省区(市)党委的高度重视。

2004年3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长沙召开协调会,就贯彻中办秘书局批复精神,开展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提出初步意见。4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与重庆市委有关领导在京向宋平同志做了汇报,得到肯定和支持。同年6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重庆市委在重庆联合召开纪念南方局成立65周年座谈会等活动。宋平同志专门发来贺信,鲁明、张颖、成元功等老同志以及相关省区党委负责人应邀参加,时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孙英,时任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镇东出席座谈会,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会议期间,根据中办秘书局批复精神,正式成立了以宋平、荣高棠、童小鹏等为顾问,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时任中共重庆市委副书记邢元敏为组长,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有关负责人,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四川、云南、安徽、江西、贵州、重庆等省区(市)党史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资料研究编写工作小组”。在随后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建立了在中央党史研究室指导下,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内设的工作小组办公室负责协调日常事务的工作机制;提出了继续修改完善《中共中央南方局史稿》,协作开展《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专题类书稿编写,以及选编《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文献选编》等任务,并决定首先启动丛书专题类第一期六本书稿(即《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党建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军事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群众工作》、《红岩精神研究》)的编写,以最终形成丛书“一主九专”结构的工作计划;确定了每年召开一次工作小组会议(由各成员单位轮流承办),以加强交流、研讨问题、检

验进度、部署任务的工作模式,并以《会议纪要》将相关任务固定下来。这次会议的重要意义,在于确立了南方局历史研究和编写工作的基本任务和目标,建立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和比较完善的工作机制。会后,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国家副主席曾庆红作出重要批示:“就是要通过我们扎实有效的工作,让红岩精神永放光芒,发扬光大。”

自此以后,中央党史研究室由李忠杰副主任负责,进一步加大了对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的领导力度,从整体上统筹协调和组织部署每年的工作任务;有关省区(市)党委及党史部门认真贯彻中办秘书局批复精神和重庆会议确立的任务,高度重视,加强领导,从人力物力上为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创造必要条件;工作小组办公室也切实履行职责,在信息沟通、工作协调、档案查阅以及会议组织等方面提供大量服务。2005年11月、2007年6月和2008年12月,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资料研究编写工作小组相继在昆明、武汉、重庆召开了第三、四、五次会议。李忠杰每次都亲自出席,对南方局历史研究和《丛书》编写工作提出指导性原则,把关定向,解决各种复杂问题,同时检查工作进展,根据不同阶段的特点提出明确的任务要求。每次工作会议主题突出、任务明确,对涉及南方局历史的重要问题展开研讨,充分交流意见,最后达成共识。这些工作会议从一开始就形成了“务实、认真、和谐、高效”的风格,并一直坚持至今,从而保证了以《丛书》编写为主体的南方局历史研究按预定计划顺利推进。正是由于坚持这样的工作机制和工作作风,南方局的历史资料研究和编写工作一直保持着“年年有部署、年年有检查、年年有推进”的良好局面。

如何统筹规划丛书编写工作,保证丛书质量,是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一直注意的中心问题。每次工作会议,都对此进行了认真研究。李忠杰副主任在2005年的昆明会议上,提出了关于编写工作的九条意见、要求处理好的十个关系,强调体例结构要坚持“横向展开,纵横结合,脉络清楚,反映全貌”的总要求,丛书各个专题之间要坚持“大系统、多侧面;大统一,小灵活;大分工,小交叉”的分工原则。在2007年的武汉会议上,又根据编写工作的进展情况提出了十二条要求。在2008年底的重庆会议上,针对审稿中提出的问题,进一步明确了九条处理意见。历次工作会议对这些原则和要求都达成了完全的共识。经过各成员单位近五年的努力,现已编写完成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较好地遵循和体

现了这些原则、要求和意见,达到了“主题鲜明,观点正确;系统完整,结构合理;史料翔实,内容丰富;表述准确,文字流畅”的要求。丛书集中反映了十几年来在南方局历史资料征集和研究领域所取得的新进展,比较好地搭建起了南方局历史研究的学科体系。

现在,这套承载着南方局老同志的多年期望,寄托着中央领导同志的关心支持,凝集着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者们长年心血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研究丛书》终于出版了。这套丛书,以《中共中央南方局史》为主干,以《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统一战线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党建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文化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军事工作》、《中共中央南方局的群众工作》、《红岩精神研究》等一期专题类六部书稿为支干,连同此前已经出版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大事记》、《回忆南方局》、《中共中央南方局历史图集》等书,共同构成了南方局历史研究的基本成果,是迄今为止对南方局历史及其功绩、经验最全面最系统的一次总结,是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协作开展中国共产党专史研究的一次成功尝试,是党史工作者历史责任和攻坚克难敬业精神的凝聚。在此之后,我们还有若干专题书籍需要继续完成并出版,在成果转化上还有一系列工作要做。但这一次这套《丛书》的集中出版,标志着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完成了主干工程,取得了决定性的成绩。

丛书的编写和出版,是我们全体南方局历史研究工作者对党所尽的历史责任,也饱含着我们对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深切缅怀之情。我们谨以这套丛书,献给中共中央南方局成立70周年,献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

2009年5月

前言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历史关头,在十分恶劣的政治环境中,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特别是统一战线政策,坚持抗战、团结、进步,维护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了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指挥中心。南方局的各项工作特别是统一战线工作,高举全民抗战大旗,对于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抗日力量,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发挥了重要作用;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为新中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多党合作政治协商制度的政治格局奠定了基础,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

从1939年1月至1946年5月,南方局根据中共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和所负责区域的实际情况,经过调查研究和分析判断,及时向中共中央报告和提出建议;南方局主要负责人以中共代表团或国民参政员的公开身份同国民党当局打交道,推动国民党坚持抗战到底;通过所属各级党组织和党内外骨干多渠道多层次地同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国民党内主张积极抗战的力量、抗日爱国将领、地方实力派、文化知识界、民族工商界、开明士绅、少数民族、宗教界和华侨等各个方面的人士进行广泛接触,密切交往,在争取抗日民主的共同事业中,与他们建立了风雨同舟、和衷共济的合作关系;同时,积极开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工作,争取了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日民主进步事业的同情和支持。

南方局的历史,是为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所进行的纷繁复杂斗争的历史,贯穿了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初期的始终。这段历史,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程中放射出耀眼的光彩,留下了极为宝贵的政治财富和十分丰富的历史资源。

从历史的角度看——

在中国共产党的奋斗历程中,统一战线作为党的一个重要法宝和政治优势,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同党的光辉历史和业绩密不可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通过建立民主联合阵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团结力量,凝聚人心,联合各方面的积极力量,为新中国的诞生和人民的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总结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经验时指出:“统一战线问题,武装斗争问题,党的建设问题,是我们党在中国革命中的三个基本问题。正确地理解了这三个问题及其相互关系,就等于正确地领导了全部中国革命。”^①“十八年的经验,已使我们懂得: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是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中战胜敌人的三个法宝,三个主要的法宝。”^②他特别强调:“中国无产阶级应该懂得:他们自己虽然是一个最有觉悟性和最有组织性的阶级,但是如果单凭自己一个阶级的力量,是不能胜利的。而要胜利,他们就必须在各种不同的情形下团结一切可能的革命的阶级和阶层,组织革命的统一战线。”^③统一战线的本质是大团结大联合,其根本任务是争取人心,凝聚力量,在毛泽东统一战线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制定了统一战线的政策,重视和运用统一战线这个法宝,不仅与农民结成坚固的联盟,还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甚至与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联合抗日,因而团结了最广泛的同盟者,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配合武装斗争和党的建设,战胜了各种困难和风险,夺取了革命的伟大胜利。

在抗日战争时期,经过第一次国共合作与分裂的锻炼和考验,中国共产党逐渐走向成熟。为推动全民抗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倡导和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整合社会资源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提供了保证,增强了民族凝聚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实现“在中国革命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这将给予中国革命以广大的深刻的影响,将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5—60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0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45页。

对于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发生决定的作用”^①。“历史的车轮将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②“统一战线的发展,将使中国走向一个光明的伟大的前途,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打倒和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的建立。”^③中国共产党以一种无畏的文化自觉和革命气概担当起整合民族力量的重任,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努力寻找同国民党中央政府、地方实力派、民主党派、文人绅士、乡党民团、黎民百姓进行互动对话的平台。使社会国家政权、地方当局、乡村社会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构建强大的抵御外侮的民族共同体。中国共产党提出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三大政治口号,贯彻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坚持国共合作;与桂系等地方实力派的政治交往则强调“不挖墙角”;对民主党派,则帮助其发展,如帮助民盟建立广西支部等;对进步文化人,则从思想上关心,生活上照顾;对百姓则在根据地号召减租减息,减轻负担。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仅强调交往、对话和共识,致力于全民族的团结,而且也致力于构建政党的主体性,强调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框架下的独立自主原则。这样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成为一种民族复兴的战略,从而使中国共产党在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中得到发展,也创生了“延安精神”、“红岩精神”等新的民族精神。通过对统一战线的研究,揭示出现实与历史的互动意义,从而获得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启示。

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斗争艺术。抗战时期,国共的政治交往本身就是一门艺术,特别在国共的谈判中表现得更为突出。“可以肯定,在国共关系史当中,两党谈判的历史是最能够集中反映双方关系的这种复杂性了。在1936—1946年间,国共两党之间的几乎所有重大矛盾与纷争,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军事上的,都不可避免地要诉诸谈判并通过谈判来解决,而国共两党自身几乎所有重要的方针和目的,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其他方面的,也都不可避免地要在谈判条件的考虑和变换中表现出来。甚至,如果我们把国共双方的历史性较量概括为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365页。

‘斗智斗勇’的话,那么,谈判本身实际上也是双方运用谋略克敌制胜的一种手段。有人说,谈判本身就是一种艺术。如果我们只是就其复杂并极其技巧性的这一特点而言的话,我们的确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艺术——一种‘斗争艺术’。在抗日战争前后,国共双方实际上也正是把谈判当成是一种斗争的重要手段的,它甚至远比那些真刀真枪的磨擦和冲突更加具有威胁性,更加惊心动魄。”^①南方局的组织系统,由于主要在国民党统治区展开,因而带有鲜明的特色。南方局的组织建设实质上也是随着统战环境的变迁而发生重大的变化。其重大的事件以皖南事变和重庆谈判为标志,前者将国共合作的关系推向破裂的边缘,直接导致了国内政治生态的变动,为深刻理解南方局提出的“三勤”“三化”要求提供了政治学的解答;后者标志着南方局统战工作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向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转变,为人们透视政治协商会议的实质提供了视角,从而深入理解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斗争艺术。

南方局的统战工作展现出独特的人文魅力。在抗日战争血与火的洗礼中,中国共产党不仅在政治力量的重新组合中占据优势,而且成为一种新的民族精神的象征。全国抗日战争爆发时,中国共产党只有不足5万军队,偏占西北一隅。战争结束时,共产党拥有90余万正规军和220万民兵,控制着9千万人口居住的地方。不言而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主要斗争形式是武装斗争,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如果没有统战工作,中共也不可能成为推动抗日民主运动并取得胜利的旗帜力量。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方局成员,以强烈的民族精神和革命精神,继承优良传统,融汇时代精神,在统战工作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这一光荣传统。他们为宣传全民抗战的正确路线,为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不懈努力。以浴火重生的文化创造激情,推动和领导了抗战文化运动,谱写了一曲曲抗战文化壮歌,成为抗战文化运动的灵魂;同时他们不断地与各种各样的卖国投降主张和行为进行毫不妥协的斗争,表现出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同志生活勤俭节约,工作夜以继日,与当时国民政府官员灯红酒绿、淫靡腐朽的社会风气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都构建了南方局独特的人文魅力,也为南方局统战工

^① 杨奎松:《失去的机会》,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作注入了精神之魅。深入研究这一工作,不仅使研究进入史料层面,而且进入文化心理层面,展现时代精神与社会的互动,加深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气质的理解。

南方局的统战工作是推动中国的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不仅要中国人民的‘命’,而且更要中国人民的‘心’。前者靠刀枪炮就能办到,后者则需要‘文化’这一把软刀”^①。日本不仅对中国实施军事侵略,经济掠夺,还对中国实施“文化战”(思想宣传战、奴化教育战、学术情报战、新闻舆论战、语言文化战、宗教文化战、文学艺术战等),推行“皇国观念”,企图摧垮中华民族的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为日本开辟侵华第二战场。南方局的统战工作,昂扬民族意识,高扬爱国主义精神,使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虽然经历了皖南事变等磨擦事件,但仍然磨而不破,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中国也成为“亚洲大陆反对日本侵略者的主要国家”^②,它牵制和消灭了日本陆军的主力,直接援助了英国和美国在亚洲战场的军事行动。深入研究这一工作,有助于认识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共同反抗日本侵略者的战争,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提高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地位与作用。

从现实的角度看——

南方局的统战工作所体现的是一种有原则的团结与合作精神。这对建构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在日本发动侵华战争,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倡议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了全民族的抗战,开创了全民抗战的新局面。经过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浴血奋战,中国人民最终取得了一百多年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第一次完全胜利。抗日战争的胜利,离不开统一战线这个法宝。同样,今天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过程中,仍然需要运用这个法宝。因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目前还有许多利益矛盾需要协调和解决。这就需要发挥统一战线具有的协调关系、化解矛盾、沟通思想、理顺情绪

① 王向远:《日本右翼言论批判》,昆仑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3页。

的功能,需要全党全社会长期坚持不懈地努力,需要最广泛、最充分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发挥各方面的创造活力,不断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南方局的统战工作,有利于在新形势新任务下全面理解和深刻领会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提高贯彻执行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切实加强和改进中国共产党对统一战线工作的领导,最大限度地各党派、各团体、各民族、各阶层和社会各界人士,团结、引导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上来。

本书在对南方局的统战工作历史进行全面论述的同时,着重关注几个问题:

南方局统战工作的主线问题。即由高举抗战民主的旗帜,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进而建立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这既涉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问题,即国共关系的合作和磨擦之间的关系及性质,同时也涉及南方局与其他政治势力的政治交往与合作关系。南方局统一战线工作的历史证明,南方局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发挥了沟通国民党当局者、民主党派、地方实力派、文化界、宗教界、少数民族和华侨等的重要作用,成为整合社会资源,凝聚民族力量的核心,成为一种拯救民族危亡的强大力量;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从空间上则是连接解放区、国民党统治区、沦陷区以及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人民力量的桥梁,发挥的特殊作用是无与伦比的。这种作用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胜利以后,国共两党重庆谈判,达到了光辉的极致。正是在这种统战工作的磨砺中,诞生了红岩精神。研究南方局的主线不仅要展现历史发展脉络,而且要展示南方局统战工作的理性精神,从而立体地展示南方局所孕育的红岩精神的内核。

南方局统战工作的运行机制和核心价值问题。南方局的统战工作,涉及必须处理好中共中央、南方局、地方组织之间的结构关系。从组织层面研究南方局统战工作的政策、策略、方法、动员机制以及社会影响范围程度、认可程度,进而把南方局统战工作研究纳入中共南方局与国民党当局者、地方实力派、民主党派、文化界、工商界、宗教界以及华侨等互动的社会学视野,达到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共性研究与个性研究相统一,充分展示南方局统战工作的逻辑生成和历史合理性,为南方局通过统战工作掌握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民主运动的领导权作出解释。

南方局统战工作的斗争原则与艺术问题。南方局的统战工作由于其统战对象的广泛性、复杂性等多种因素,使国共两党的阶级对抗性、自发性在民族性的框架下达到一定均衡。期间虽然发生分歧、磨擦,甚至武装冲突,但国共合作并没有中断。中国共产党成为抗战的中流砥柱,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以南方局为代表的中共组织在与国民党打交道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策略运用于统战工作实际,制定了一系列的斗争策略,展示了高度的艺术性,使统一战线经受了严峻考验而得到巩固和发展,赢得了民心,也使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资源不断丰富,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领导者。

南方局统战工作的历史地位问题。南方局作为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其统战政治交往实践显示出独特的历史地位。南方局极力维系国共合作抗日大局,拓宽统战工作领域,确立大统战思路,从而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同时,南方局的统战工作丰富了毛泽东的统一战线思想理论,也为新中国的政治协商制度格局奠定了重要的基础。